



创新创业也是一种情怀

——专访股权众筹服务平台InnoTREE(因果树)创始人滕放

■ 本报记者 李红阳

股权众筹是个新鲜事物,抱着了解看看的想法,记者来到位于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二层的北京因果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采访了股权众筹服务平台InnoTREE(因果树)创始人滕放。

滕放是一名“海龟”创业者,曾获得美国Drexel大学MBA学位,拥有特许金融分析师(CFA)资质,曾就职于美国谷歌公司,有10年TMT行业经验,曾在科技创新公司担任CFO,帮助科技创新公司完成融资并成功退出,在投融资、上市以及退出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自我激励:选择走创新创业之路

或许是骨子里的不安分与使命感,滕放对于没有新鲜感、没有挑战性的工作可以做好,但不愿久留。他在谷歌这样的大公司工作过,学到了很多好的商业模式与管理规程,但大公司的文化差异与职务“天花板”让他深感无处释放。“有些人天生必须是自己创业的”,他通过几年的打工经历对自身有了这样的认知。

自己创业,到底做什么呢?这是许许多多创业者首先要做的破题之课。人和人的差异可能在于,有的人是想自己创业去挣到很多钱,有的人是想创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还有的人是想通过创业帮助别人去做有价值的事。滕放应该是第三种人吧,他说:“创新创业也是要有情怀的。”

滕放和他的团队选择了股权众筹服务。这是基于他们对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以及当今新的经

济模式发展潮流的把握。本届政府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新创业者首先要面临资金来源的问题。传统的金融体系对于广大的小微企业来说,是“存得进贷不出”的,二级市场又有诸多门槛与限制,很难满足小项目、快融资的需求;新的互联网金融顺势而为,其中的风险控制与技术含量尤为关键。

好在滕放和他的创始团队在专业背景和从业经历上正好互补,分别来自金融、工商管理、法律和计算机等领域,对于联手打造股权众筹生态圈达成共识,一个全新的股权众筹服务平台InnoTREE(因果树)应运而生。“毕竟,中国市场上已有1500万合格投资人,达到大约8000亿元的私募股权资产配置规模。”

股权众筹起始于2014年,2015年则是众筹的爆发增长期。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股权众筹意向投资额超过110亿元,实际融资约为35亿元,是2014年全年(15亿元)的2倍有余。众筹(尤其是股权众筹)行业将在下半年迎来爆发期,2015年全年交易规模有望达到150~20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将由股权众筹平台贡献。在众筹风声水起的同时,必须看到,众筹行业还存在着监管机制不完善、投资门槛低、信用评级体系缺失等问题。为此,InnoTREE(因果树)将重点打造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股权众筹服务模式,这将成为其立足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独特基因。滕放说,“这也是一片蓝海”。

采访中,滕放对于事业的激情溢于言表,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他说,创新创业应该“回归初心、始于发心、一切公心”;他说,“创业是一场未知的实践,需要速度+激情”;他还说,大多数的创业者都是孤独的,

会有一段痛苦的煎熬期,要善于自我激励、说服自己,要有所放弃才能有所选择。

众筹服务:帮助别人实现创新创业

带着自身创新创业的经历与经验,滕放踏上了一条跨界融合之路。他认为,股权众筹是跨界的新生事物,其业务模式体现了投资银行、风险投资以及互联网数据等多种特性。他用三个三分之一来表述这种跨界属性:即券商投行三分之一、风险投资三分之一、互联网三分之一。股权众筹的未来将是这三种业态的有机融合。

为此,InnoTREE(因果树)借用“树”所代表的生态概念,在普惠金融领域打造股权众筹生态圈,服务广大小微科技创新型企业,向投融资双方提供全方位的融资咨询、法律咨询、人力咨询以及宣传推广服务,包括:针对企业的特点进行商业模式和融资策略的梳理,例如商业逻辑的整理、融资额度的确认、估值的参考、投资机构的推荐等;为企业股权众筹、期权结构方案的设置以及企业合同的标准模板;为企业项目提供展示的平台,推荐合适的投资人以及注册合伙人;提供精准分析企业的数据报告,为投资人和融资企业提供决策的依据。可以看出,这些服务是非常具体的、务实的,特别贴合创业者的需求。有时候,滕放还现身说法,与创业者面对面交流创新创业路上的经历,分享其中的苦与乐。

滕放抓住了机会,也释放出热情,更与团队互相激发智慧。从专业的角度看,投融资本身涉及多方面的服务,而且一级市场的股权融资风险大,投资人需要多方面考虑,才会做最终的投资决定。融资方也一

样,他们的诉求多样,只有真正满足了他们最核心的诉求,才能够撮合双方交易。从InnoTREE自身来说,滕放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对平台上的项目做规范的尽职调查,通过与律所、券商等第三方服务机构合作为融资企业增信;在此基础上,当合作更加深入时再加入人力、市场、管理等其它有针对性的服务,这些服务之前大多由风险投资机构内部提供,未来在股权众筹平台上将由与平台战略合作的第三方机构提供,并逐步“互联网化”;最后再加上众筹模型天然的杠杆功能,完成对领投人的激励与跟投人风险收益,最终形成一个基于互联网“众包”的新型风险投资生态圈。据了解,InnoTREE的这种服务模式得到了政府管理部门的认可,近期先后获得北京市科委颁发的“众创空间”和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颁发的“创新型孵化器”称号。

针对中国证监会日前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关于对通过互联网开展股权融资活动的机构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滕放表示,“虽然短期内会给股权众筹行业带来阵痛,但长远来看,却可以抬高门槛,将不符合规范的平台挡在门外,可有效避免良币被劣币驱逐。”

基于互联网的特性,滕放看到的不仅仅是平台项目的成交量,“必须要有百万级的注册用户”,他说,“这是互联网经济必须要有的发展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不管是众筹、交易、活动还是大数据分析,才能“唯有源头活水来”。

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众筹平台在全产业链去整合资源,专业化地解决能力匹配问题。“我们已经开启股权众筹2.0的节奏了”,在采访的第二天早晨,记者看到,滕放把他的微信群命名为“股权众筹2.0”。

中美网络战是零和博弈



一直以来,中美就网络安全问题存在着分歧。两国都认为对方侵入和侵犯了本国网络安全,对于对方国家的骇客均保持了持续的警惕和批评态度。

当然,这种警惕和批评充满了对对方的严重不信任,认为网络侵入具有国家主义导向下的目的性。

中美有各种机制性的对话,从战略到经济及国家安全。无一例外,网络安全都是双方讨论的焦点之一。显然,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成为制约中美关系的大难题。

据《新华社》援引7月31日《纽约时报》消息,奥巴马政府决定就此所谓美国政府计算机网络遭攻击一事对中国采取报复手段。

虽然这一消息是否确实有待验证,而且美国并未将骇客源头指向特定国家。但中国,无疑是美国认定、指责和报复的主要目标。因此,美国对华实施网络报复的媒体观点,并不令人惊奇。

尽管如此,若美国政府真的公开用“报复”这一词汇并实施行动,中美网络战将不可避免。双方政府网站、企业系统和个人信息,将陷入永无宁日的恐慌中。

更重要的是,这将是信息时代的新型战争,虽然没有枪炮、不见硝烟和流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冷兵器和热兵器战争。

毕竟,从国家机器到市场运营乃至日常生活,早已经离不开网络载体。一场意外停电造成的巨大损失,都将至人心惶惶,更何况是网络停摆后的社会系统全混乱!

因而,中美这两个最大经济体最大国家的网络战,注定是零和博弈和两败俱伤。这场战争还是不要的好,美国与其发狠任性,还不如和中国好好商量。两国连复杂的“3T”矛盾(台湾、贸易和西藏)和地缘政治冲突都能维持在和平范畴内,网络冲突难道要鱼死网破?

从技术主义出发,美国不希望本国互联网主动权被他国分享,恐怕这也是美国抱怨中国网络侵入美国的主因之一。

世界在变,无论是全球战略还是技术革命,乃至全球治理结构,美国所拥有的份额都在发生变化,而发展迅速的中国成为美国拟议中的最大挑战者。

值得一提的是,中美不仅存在意识形态的差异,在国家安全的理念上也迥然不同。

作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除了担忧网络骇客对其国家机器的滋扰,更忧虑外国骇客对美国市场主体商业机密的获取。

而中国强调的是国家主义的安全观,对于市场主体的商业安全,更多由企业自主负责。

由此,中国颁布了《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草案)》,对此美国理解为对中国对互联网的全方位控制。美国也想当然地认为中国骇客对美国的网络攻击是国家行为。

两种政治体制、两个强大国家,正在亚太区域进行着博弈。网络战不过是这场看不到尽头大国博弈战的一场小战斗、一个小冲突。只要中美能够管控住战略风险,网络战掀不起大风浪。

(张敬伟)

中国人该庆幸 股市暴跌发生在现在

■ 余永定

当今国际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没有理由一定要把资本项目自由化当作经济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之一;是否应该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和如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

资本项目自由化并非历史潮流,没有站得住脚的经济理论可以证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主张今天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念。

1993年,中国政府首提“实现人民币可兑换”。1994年,中国对外汇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中国自1996年12月1日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第二、三、四款的义务,实现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中国政府希望在此后5年左右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

但中国政府还未来得及给出资本项目可兑换时间表,亚洲金融危机就爆发了。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货币可兑换计划被搁置。

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重新提出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指出应该:“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政策意向。

应该说,在实践中,中国对待资本项目自由化是相当谨慎的,一直坚持渐进的方针。但在理念上,中国不仅把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作为改革的目标,而且是念兹在兹。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关于金融改革的相当一部分文字是有关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其中的关键两个字是“加快”。对于“加快”一词应做何种解读?

坊间一直有传言,中国将在2015年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度实际上已经不低,根据外管局资料,在七大类40项资本交易项目中,在中国只有10项不可兑换,除个人直接跨境投资、衍生品交易外,主要跨境资本交易都有正规渠道。

中国的资本管制主要是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即通过QDII和QFII等限额体系对短期跨境资本的投资主体和投资额度进行控制。

如果“加快”意味着在2015年或2020年以前中国将

取消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入的管制,我们就不得不表示忧虑了。

2015年6月15日以来中国股市的暴跌充分显示中国金融市场还远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我们的金融管理当局也并非像想象中的那样“无所不能”。

中国应该庆幸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1997年7月而不是在一两年之后。中国也应该庆幸股市暴跌发生在2015年6月-7月,而不是在一两年之后。

我们应该好好问问自己:如果中国此时已经完全开放了资本项目,国内外资金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A股市场,我们将会面对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中国的股灾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果我们能及时调整资本项目自由化政策,善莫大焉。

中国是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人民币终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或主要储备货币之一,或主要储备货币的主要构成部分)。

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是人民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因而,中国终有一天会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

基于这种逻辑,我支持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逐步开放资本项目、逐步实现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

但笔者同时确信,中国没有理由为了一些想象中的,充其量是高度不确定的好处,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忙开放资本项目,甘冒与之如影随行的种种巨大风险。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如果有人问:中国最容易在什么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笔者毫不犹豫地回答:过早地资本项目全面开放。

中国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不能通过资本项目自由化来解决,或通过该举措的所谓“倒逼机制”来解决。

中国目前面临着稳增长、调结构、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提高对外开放质量的种种挑战,不应该过分强调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如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

人民币国际化应有助于改善中国对外资产与负债的币种结构,增强中国储备资产的安全。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应受制于中国经济发展和资本项目自由化进程,不能急于求成。在坚持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渐进方针的同时,中国必须加速国内的各项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